

## 论我国“剩女”问题及其社会影响

■ 龚 超 李春丽

(广州医科大学卫生管理学院,广东广州510182;广州市团校《青年探索》编辑部,广东广州510635)

**【摘要】**“剩女”现象已经演变成社会焦点问题,她们是女性中的特殊群体。男性主导的传统婚姻定势与“剩女”的婚姻趋向相反而造成两性间的紧张。“剩女”深受现代性主导下的算计、理性、权利、契约和自我满足等价值观的影响。如果城市“剩女”比例上升,不仅会影响到社会文化的代际传递和延续,还会给生育健康服务系统提出高要求,同时也会加剧贫困地区的“婚姻挤压”现象,甚至会给未婚女性带来恐慌。

**【关键词】**“剩女” 大龄女性 婚恋趋向

DOI:10.16034/j.cnki.10-1318/c.2015.02.003

2007年教育部发布了《2006年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》,其中包括了171个汉语新词,“剩女”一词赫然在列。沈晖认为,“剩女”是指现代都市女性、并且绝大部分拥有高学历、高收入、高智商(简称“三高”),长相也无可挑剔,因择偶要求较高导致在婚姻上找不到理想归宿的大龄女青年<sup>[1]</sup>。这一指称表明“剩女”现象并非婚姻市场供需不平衡,而是自身选择的结果。“剩女”现象的出现,其本质原因究竟是什么?“剩女”比例的上升会给社会带来哪些影响?本文试对此进行分析。

### 一、“剩女”问题的提出

多数学者认为“剩女”已成为全球性社会问题,但也有人持否定态度。陈友华教授在《剩女:一个建构失实的伪命题》一文中通过对“剩女、过剩女性数量和过剩女性比例”三个关键词的论证,认为“剩女”是一个建构不真实的命题,完全是眼球经济与消费社会合力作祟的结果<sup>[2]</sup>。

中国是否存在“剩女”现象,大龄未婚女性的现状如何?事实上,目前中国确实存在一批高学历、工作体面且收入相对丰裕、超出“黄金婚龄”的“白骨精”(白领、骨干、精英)。有学者对1960年到1990年东亚、东南亚一些国家(包括中国)30-49岁女性未婚比例的变化趋势做了调查,结果显示“过去的二十年中,尽管西方国家的婚姻普遍性也出现了迅速下降的趋势,但是,东亚和东南亚国家,尤其是在这些国家的大城市,妇女不结婚的现象日益增多,甚至比西方国家

收稿日期:2014-12-20

作者简介:龚超,广州医科大学卫生管理学院副教授,博士,社会学博士后,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、社会学理论;

李春丽,广州市团校《青年探索》编辑部主任,副教授,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,主要研究社会政策与社会管理、德育与青年工作。

基金项目:本文系广州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“卫生经济学课程的教学实践与改革”(课题编号:2013A092)的研究成果。

还要严重。”<sup>[3]</sup> 研究认为婚姻所要求的经济可行性条件上升、对婚姻的期望上升、可选择的结婚对象短缺、婚姻的决策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等是造成“大龄”未婚比例上升和女性终生单身比例上升的主要因素。学者又对 1997 年至 2005 年 30-34 岁未婚女性进行了综合调查, 结果发现 30 岁的未婚女性比例从 1.2% 激增到 3.4% ,且主要集中在城镇(占 30-44 岁全部未婚女性的 72.1%)<sup>[4]</sup>。2004 年天津社科院调查了近 50 万名未婚成年人, 发现女性占了六成以上, 其中才貌双全的占 70%。2005 年学者调查发现, 北京 30-50 岁的单身女性已达到 30 万, 上海达到 43 万<sup>[5]</sup>。上海热线关于“剩女”的调查显示, 认同独身观念的女大学生占 82.79%, 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高学历女性群体中此比例达到 89.94% ,而来自全国妇联的《2009 中国人婚恋状况调查报告》显示, 当前中国城市有 41.2% 的女性担心自己找不到配偶<sup>[6]</sup>。

可见, “剩女”现象已经演变成社会焦点问题。这个群体业已引起我国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。

首先是吸引了媒体的“眼球”。2006 年 5 月 26 日, 中国经济网以头条新闻报道了“剩男剩女时代来临”。2007 年反映“剩男剩女”的情感影视剧、话剧陆续问世, 2008 年末一批“情剩”题材的贺岁片集中上映, 将“剩男剩女”推向高潮。如《桃花运》《爱情呼叫转移 2: 爱情左右》《女人不坏》《非诚勿扰》和《游龙戏凤》等。发展至 2012 年, 家庭情感伦理剧占据了一半以上的电视电影“荧屏”, 如《大女当嫁》《大男当婚》《过把瘾》《中国式离婚》《金婚》《幸福来敲门》等。

其次是商业机构的“金视”。“剩女”年龄稍长, 阅历相对丰富, 敢于投资, 而且经济独立、消费压力相对偏小, 她们对时尚具有较强的阅读能力, 这促使她们更加关注自我, 所以这样的群体自然成为商家的“绩优股”。各路商家各显神威, 为“剩女”量身定做了系列广告, 开发了系列产品, 还有房产商打出“大龄剩女买房招亲”, 等等。商家为了获取更多的顾客, 甚至刻意进行概念炒作, 给单身都市女性贴上标签, 制造了“剩女恐惧”。

最后是官方机构的关注。2006 年 8 月《剩男剩女》社会科学读物出版发行, 2011 年一些新闻媒体、报纸头条采用“剩男剩女”作为专业词汇解读全国人口普查结果、分析社会现象。

学界、教育界对“剩女”现象的研究逐渐丰富。尽管学者谈到首先需要定义“剩女”概念的内核与边界, 这是需要斟酌的迫切课题, 不仅关系到理论的适用程度, 更关系到操作层面的测量与建模, 但是概念的提出无外乎经验层面和抽象推理, 遵循着实践到理论再到实践的思维路径。“剩女”群体毕竟不是一般的女性, 而是女性中的特殊群体<sup>[7]</sup>。

## 二、“剩女”现象形成的本质原因

伴随生产力的进步、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, 政治逐渐开明, 文化进步了, 女性自由并解放了。女性的权利在各个领域得到了普遍提升, 女性日渐摆脱了男权主导的霸权体系。以前男性建构的社会主张按照同等条件也适用于女性诉求, 生产上已经解放了的女性精英(“剩女”)开始建构自己的话语体系。2008 年 10 月 28 日, 全国妇联副主席黄晴宜指出, 女性就业人口占总人数的 45.4%, 全国女干部和女党员占 39% 和 20.4%。一般看来, 走上工作岗位意味着经济独立, 担任干部和党员意味着成为骨干。2005 年全国普通高校在校女生占 47.08%, 2006 年复旦大学新招录女大学生占 52.3%, 2007 年南开大学新招录女大学生占 49.2%<sup>[8]</sup>。这组数据说明越来越多的女性可以接受良好的高等教育, 教育对于女性的意义不仅仅是为她们创造了就业的机会, 而且培养了她们对社会的认知, 使她们不再满足于传统婚姻关系和家庭模式, 她们越来越渴望改变家庭和夫妻之间的不平等关系, 希望和男性一样参与社会。“剩女”危机就是男女性别主体双方社会博弈的结果, 在双方价值取向缺乏良性互动机制的前提下, 男性主导的传统婚姻

定势与“剩女”取向的婚姻趋向会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,所以会造成两性间的紧张甚至冲突。随着“剩女”越来越多,这样的冲突会逐渐升级,强度会越来越大、范围会越来越广,其中对女性的伤害会加大,如果这种紧张长期得不到缓解,女性追求自由与解放的理想就会受挫。

现代文明的进步何以带来两性婚姻价值观的冲突?在丹尼尔·贝尔看来,“剩女”困境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有关联,物质财富的增长使女性的独立性增强,但政治承诺的自由平等并没有“降生”到操作层面,外加传统婚配观与西方价值观对适龄女性的拉扯,三方面综合作用才产生了“剩女”群体<sup>[9]</sup>。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点:其一,“剩女”在经济领域取得相对独立地位的同时,希望能够按照自己的理想建构婚配关系。“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、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。”<sup>[10]</sup>其二,政治保证女性平等走进社会,无法为“剩女”的婚配博弈提供具体援助。恰如恩格斯所述“妇女的解放,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、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,而家务劳动只占她们极少的工夫的时候,才有可能。”<sup>[11]</sup>其三,“剩女”现象是传统婚配文化与现代文明冲突的产物。一方面,传统婚配文化主导下“责备受害者现象”促使“剩女”这一群体日趋扩大;另一方面,女性在参与现代工业文明过程中的错误归因会造成“剩女”处境雪上加霜。拉葛雷在研究这一问题时忧心忡忡地指出,许多年轻人把爱放在首位,并不在乎别人如何看待他们,不在乎与所爱的人结婚与否。他们追求的是个人的愉悦,在恋爱关系当中寻找肉体和心理上的满足。他们希望将自己的性欲独立出来,从不否认生活中性与欲望的重要性……他们通常会把爱与性混淆。浪漫的感觉可以瞬间闪现,同时也快速消失。承诺和义务几乎无法在亲密的关系中得到检验。性自由的观念促使大量婚前性行为的发生,从而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<sup>[12]</sup>。

### 三、“剩女”比例上升带来的后果

#### (一) 适龄青年不婚比例上升影响到社会文化的代际传递和延续

我国传统伦理追求家庭和谐,突出家庭中男性女性责任、义务和忠诚等价值观念。新时代“剩女”的父母亲在传统中继承这一伦理观念,无法接受自己的女儿成为社会的“剩品”,所以不惜一切代价、想尽一切办法为女儿们相亲,而“剩女”们却并不顾忌这些,她们为了满足欲望而极力推崇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。在这个意义上她们已与传统的婚姻伦理观背道而驰,父母的操心和努力很难有好的结果。如果适龄女性不婚比例上升,必将增加父母的心理负担,这将直接影响到家庭的和谐,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传统社会文化的代际传递和延续。

#### (二) “剩女”比例上升给生育健康服务系统提出了高要求

权利、自由成为现代社会追求的核心词,可权利被很多年轻人置换为“欲望”、自由被置换为“选择”,欲望合理化,个人道德负担消减使消费主义风靡,并进而控制青年男女思想观念。现代社会的物质生产以挖掘和满足个人欲望为目的,创造了丰富的产品,这些产品获得了体制的“通行证”,在各个领域“大行其道”。于是避孕、节育和感官享受的工具和药物生产火爆起来,以生殖为目的性生活让位给生理满足,这种欲望被放大并走出婚姻的“高墙”,走向了社会深处。西方国家“大龄”单身女性、未婚同居、永久单身和同性恋早已获得宽泛的体认,但是在中国,传统婚姻观与现代性正在撕扯着新时代青年男女,部分青年受现代性严重影响,也给社会带来了婚前性行为、未婚同居、人工流产、弃婴、性传播疾病(STDs)和艾滋病(AIDS)的传播等问题。所以,社区需要针对成年未婚女性,进行有组织的生育健康服务,如性知识的教育、优生优育健康理念的培育、传染性疾病预防的讲座等,这无形之中加大了社区的压力;如果“大龄”未婚女性的比例持续上升,还会导致社会生育率下降。

### (三) “剩女”比例上升会加剧贫困地区男性“婚姻挤压”

瓦莱丽·赫德森和安德烈亚·博尔在《剩男: 亚洲男性人口过剩的安全意义》一书中预测: 到2020年中国“剩男”有3 000万-4 000万(占年轻成年男性人口的12% - 15%), 其他学者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预测结果<sup>[13]</sup>。这意味着有数千万“剩男”找不到老婆, 这种现象会直接影响社会稳定。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, “剩男”主要集中在低文化且各方面条件不好的穷乡僻壤, 这一方面是由于贫困地区适婚女性流动到相对富裕地区造成的, 另一方面是农村性别比例长期失衡造成的。但是, 文化素质相对较高的“剩女”婚姻观比较讲究, 要同质匹配、要平等交换资源, 还要梯度择偶。2009年一项调查表明, 有四成的女性对婚姻要求较高, 不会“下嫁”委屈自己<sup>[14]</sup>。结果想娶的娶不了, 想嫁的嫁不出去, 如果“剩女”比例持续升高, 将进一步加剧贫困地区性别比例失衡, 同时也加剧了“剩女”滞婚现象。

### (四) “剩女”自我指涉呈现低龄化倾向 给未婚女性造成压力

“剩女”是社会中的佼佼者, 各方面的能力都较强, 她们有较好的教育背景, 她们也常会“反躬自省”, 相比于其他参照群体, 她们常检视自己的不足并建构自己的婚姻理想。当然, 她们的这种审视是希望能够自我满足, 可这种感受来自于社会评价标准。譬如, 她们建构自己的婚姻观念会按照社会标准来取舍, 因此, 社会媒体和日用词汇频繁使用的“剩女”评价将对未婚女性产生巨大影响。这不仅对未婚年少无男友的女性会有标签性影响, 使“剩女”指涉呈低龄化倾向, 而且会对未婚适龄女性产生无形压力, 甚至会引起大龄未婚女性自我认知危机。总的来看, 现代文明推动下的婚姻观呈现算计、理性、平等、契约精神, 突出个体消费, 并将欲望演变成个体的权利并赋予文化价值。正是这种“消费伦理和奢侈精神”使“适龄”未婚女性成为“剩女”, 这一“杰作”与中国传统婚姻诉求的包容、道义、责任的价值观相悖, 这个问题已成为当今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。

## [ 参 考 文 献 ]

- [1] 彭 琰 侯丽华 《新知趣闻: 教育部公布的 171 条汉语新词目的详解》, [http://edu.ce.cn/young/campus/200708/21/t20070821\\_12623293.shtml](http://edu.ce.cn/young/campus/200708/21/t20070821_12623293.shtml)
- [2] 陈友华 吕 程 《剩女: 一个建构失实的伪命题》, 载《学海》2011年第2期。
- [3] 谭 琳 Gavin W. Jones 《论“大龄”女性未婚问题及其社会人口学影响——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比较研究》, 载《人口研究》, 1997年第7期。
- [4] 宁 鸿 《“剩女”现象的社会学分析》, 载《理论界》2008年第12期。
- [5] 吝莹莹 《透视当代都市青年“剩女”现象》, 载《今日南国》2008年第5期。
- [6] 《2009 中国人婚恋状况调查报告》( 精选) , <http://bjsite.sohu.com/20100112/n269516739.shtml>
- [7] 郑必俊 《中国女性的过去、现在与未来》, 北京: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, 第6页。
- [8] 《大学生比例出现反超, 高校出现“女生潮”》, 载《中国青年报》2007年10月31日。
- [9] 丹尼尔·贝尔 《资本主义文化矛盾》, 赵一凡译, 北京: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, 第56页。
- [10] 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(第2卷), 北京: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, 第32页。
- [11] 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(第4卷), 北京: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, 第162页。
- [12] 让-查尔斯·拉葛雷 《青年与全球化: 现代性及其挑战》, 陈玉生 冯 跃译, 北京: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, 第90-91页。
- [13] 李 果 《我们对坏世界的好设想》, 载《读书》2010年第12期。
- [14] 钱铭怡 王易平等 《十五年来中国女性择偶标准的变化》, 载《北京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》2003年第5期。

(责任编辑: 任天成)